

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 GDP 就业弹性问题的初步研究

常进雄

【摘 要】 由于就业弹性的下降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未能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文章从要素供给、经济体制变革及经济增长等方面详细考察它们对就业弹性变化的影响,并分析在就业弹性下降过程中所体现的一些积极的就业意义。研究结果表明,要素禀赋因素并不是影响就业弹性变化的重要因素,而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收入、经济增长导致的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才是影响就业弹性变化的重要因素。所以,过分强调节约资本资源、发挥廉价劳动力优势并不能提高就业弹性,进一步扩大经济主体产权的多元化和设法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才是提高就业弹性和促进就业的关键。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就业弹性 影响因素 就业评价

【作 者】 常进雄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应该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仅带来财富的增加,还会显著地扩大就业。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却未能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其关键原因在于 GDP 就业弹性迅速降低,使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带动作用减弱,出现了无就业增长。

从资源禀赋结构来看,中国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资本资源却相对稀缺,根据这一基本国情,应当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合理节约资本资源。但是,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为什么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没有被充分使用,而相对匮乏的资本资源、自然资源却得到大量使用,并使中国的就业压力空前突出起来?

很多学者认为,要素价格的扭曲导致了中国出现无就业增长和 GDP 就业弹性下降的趋势。张军(2003)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大量投入和积累,而资本的大量投入和积累使得企业在技术选择上显示了资本替代劳动的偏差,使技术路径偏离了要素禀赋的自然结构,加快了资本的深化过程,劳动力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受到排挤,GDP 就业弹性出现下降的趋势。而导致过度投资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又是由于国家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改变了贷款的流向,使绝大多数贷款为国有部门所获,银行不愿提高利率,因为利率的上升会威胁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托马斯·G·罗斯基,1999;周其仁,1997)。除此之外,逐步攀高的工资成本也一

步步地减少了就业的增长,由于偏高的劳动力价格和资本利息的偏低,投资的资本密集倾向在微观水平上是理性行为,并对就业形势产生消极的影响(陈剑波,1997;周其仁,1997)。此外,资本的过度投资和过度积累也导致了快速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也是影响中国 GDP 就业弹性下降的重要因素(袁志刚,2002)。

上述研究从要素供给的角度出发,仅仅考虑要素价格的扭曲——即劳动力价格的偏高和资本价格的偏低,并未考虑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经济环境来看,从受要素供给制约的环境转变到受需求制约的环境,而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 GDP 就业弹性的下降应该与经济环境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受制于要素的禀赋结构。同时,经济体制环境的变革因素也应该对中国 GDP 就业弹性有很大的影响,如 20 世纪 90 年代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导致大量的工人从国有和集体企业内下岗失业,经济主体产权的多元化也使得非公有制经济产生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如何认识决定 GDP 就业弹性变化的因素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对于实践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涉及到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如何更好地利用充沛的劳动力资源,节约相对匮乏的资本资源,达到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的双重目标。

二、影响中国就业弹性变化的因素分析

根据经济学理论,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里,丰富的生产要素其价格相对便宜,而稀缺的生产要素其价格相对昂贵。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必然会更多地使用价格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而节约使用价格昂贵的生产要素。在中国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应当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符合要素的禀赋结构,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双重效果。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延续了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并使绝大多数贷款为国有部门获得,进而改变了要素的自然价格结构,出现了过度投资行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并在微观上属于理性行为,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明显,并对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直接导致了就业弹性的下降。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对就业弹性产生影响,应该是通过要素的价格结构产生的,因此这里资本要素的价格用一年期的贷款利率减去物价指数即一年期的贷款实际利率(Rate)来表示,劳动力的价格则用职工工资(Wage)来表示,并在计量模型里估计它们对就业弹性的影响程度。

然而,仅仅考虑要素禀赋结构对就业弹性的影响是不够的,因为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受要素供给制约转变为受需求约束的增长环境。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考虑需求环境的变化对就业弹性的影响。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与人均收入的逐渐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就业弹性的变化也应该与人均收入的提高存在着某种联系。如果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那么就可以从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的趋势下判断出未来就业弹性的一个变化趋势,因为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也是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所以,探究就业弹性与人均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还需要考虑经济体制变革对就业弹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领域里有两个重要的变革对就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经济主体产权制度的变革,通过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这里用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这里用工业部门中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

代替(NOSW)。另一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劳动就业制度的变革,使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有了更大的用工自主权,并在 90 年代导致了大量的工人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失业。这里用职工人数占整个城镇就业人数的比重(NSE)来表示(见表 1)。

表 1 GDP 就业弹性及其影响因素

年份	就业弹性	非农就业弹性	城镇就业弹性	人均 GDP* (元)	工资水平* (元)	实际利率** (%)	非国有化程度(%)	城镇就业人员中职工比例*** (%)
1978	0.17	1.531	0.428	379.00	615.00	4.34	22.37	99.84
1979	0.29	0.618	0.671	402.12	656.20	3.14	21.53	99.68
1980	0.42	0.877	0.674	428.26	696.20	-2.46	24.03	99.23
1981	0.62	1.030	1.787	444.96	687.90	2.54	25.24	98.98
1982	0.40	0.384	0.072	478.33	697.50	5.20	26.64	98.71
1983	0.23	0.540	0.255	522.82	708.00	5.20	26.64	98.03
1984	0.25	0.880	0.271	594.44	815.60	4.50	30.91	97.23
1985	0.26	0.604	0.351	665.18	858.80	-1.38	35.14	96.49
1986	0.32	0.778	0.429	713.07	930.10	1.42	37.73	96.37
1987	0.25	0.471	0.318	782.95	939.10	0.62	40.28	95.87
1988	0.26	0.404	0.311	857.33	931.59	-9.80	43.21	95.38
1989	0.44	0.022	0.210	878.77	886.87	-6.66	43.93	95.50
1990	0.68	1.08	1.160	898.98	968.46	6.62	45.39	82.50
1991	0.22	0.235	0.270	968.20	1007.20	5.24	43.84	83.07
1992	0.13	0.283	0.160	1092.13	1074.68	2.24	48.48	82.82
1993	0.12	0.452	0.166	1225.37	1150.99	-3.72	53.05	81.31
1994	0.10	0.463	0.170	1365.06	1239.61	-13.12	61.96	79.61
1995	0.11	0.528	0.198	1492.01	1286.72	-7.02	66.03	78.3
1996	0.14	0.511	0.483	1617.34	1335.61	2.23	71.52	74.52
1997	0.13	0.283	0.490	1741.88	1350.31	5.84	74.48	70.58
1998	0.06	0.176	0.515	1860.33	1447.53	7.88	78.43	57.07
1999	0.13	0.066	0.519	1975.67	1637.15	7.25	79.69	52.53
2000	0.10	0.146	0.412	2115.94	1823.79	5.45	77.97	48.63
2001	0.18	0.179	0.467	2257.71	2101.00	5.15	81.95	45.08
2002	0.13	0.123	0.413	2420.26	2426.66	6.11	84.41	42.61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3)》相关数据进行计算。* 为 1978 年价格;** 为一年期的企业贷款实际利率=一年期的企业贷款名义利率-CPI;*** 为职工人数/城镇总就业人数。非农就业弹性=非农就业增长率/GDP 增长率,它不仅包括城镇的非农就业还包括乡村的非农就业。城镇就业弹性=城镇就业增长率/GDP 增长率。

另外,在考虑上述因素对就业和就业弹性影响时,不仅要考虑它们对 GDP 就业弹性的影响,还要考虑对 GDP 非农就业弹性、GDP 城镇就业弹性的影响。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人均收入(Y)的增加,还意味着劳动力从农业部门逐渐向非农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镇转移。

依据上述变量的含义,本文建立一个中国就业弹性影响因素的综合评价模型: $E = A_0 + A_1Y + A_2Wage + A_3Rate + A_4NOSW + A_5NSE$,并用 SPSS12.0 统计软件分析,结果见表 2^①。

① 本文数据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3)》或根据该书数据计算得出。

(一) 资本价格、工资水平对 GDP 就业弹性的影响分析

从分析结果来看,要素供给因素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在所有的影响因素中是最小的,而且实际利率水平——资本价格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显示资本价格因素对就业弹性的变化没有影响。对就业弹性和资本价格因素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小(见表 3),散点图(见图 1)也显示它们之间缺乏联系。由此可见,资本价格——实际的利率水平不是影响就业弹性变化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业增长缓慢并不是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实际的利率水平对就业没有影响可能是两个效应的综合结果:一方面,利率水平的下降使得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来说显得更加便宜,企业就会更多地使用资本来代替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价格的下降可以使就业弹性下降,这就是实际利率下降的替代效应。另一方面,资本价格的下降却推动了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产出,从而带来更多的就业增长,这就是实际利率下降的规模效应。因此,实际利率水平的下降具有两个相反的效应,很难分清哪个效应起的作用更大。更重要的是,银行的贷款绝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但由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缺陷和预算软约束,贷款利率的高低对于企业的经营起不到应有的约束作用。所以单纯从实际利率水平变化的角度上是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就业弹性的下降。

在市场经济且劳动力市场发育完善的条件下,劳动力的价格变动和从业人员数量之间的关系应该呈现反方向变动。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增长,从业人员的数量应该减少;劳动力价

表 2 中国就业弹性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GDP 就业弹性	GDP 非农就业弹性	GDP 城镇就业弹性
截 距	1.986 (1.904)*	16.448 (2.658)**	19.699 (2.829)**
人均 GDP	-0.003 (-3.511)**	-0.021 (-4.889)**	-0.024 (-4.807)**
工资水平	0.001 (2.489)**	0.006 (2.789)**	0.006 (2.620)**
实际利率水平	0.001 (0.16)	0.012 (0.296)	0.015 (0.342)
非国有化程度	0.038 (2.921)**	0.341 (4.455)**	0.379 (4.398)**
城镇就业人员中 职工的比例	-0.02 (-2.199)*	-0.187 (-3.405)**	-0.224 (-3.617)**
F 值	5.605	6.784	6.399
R ²	0.584	0.629	0.615
调整后的 R ²	0.479	0.536	0.519
D. W. 值	1.279	1.812	1.871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 3 1978~2002 年就业弹性与实际利率的相关系数

	GDP 就业弹性与 实际利率	GDP 非农就业弹性与 实际利率	GDP 城镇就业 弹性与实际利率
相关系数	0.022	0.151	0.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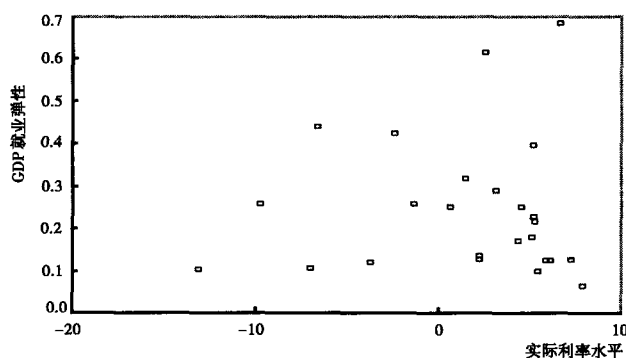


图 1 GDP 就业弹性与实际利率水平的关系

格降低,从业人员的数量应该增加。同时,中国劳动力的价格相对低廉,也应该能够提高 GDP 就业弹性。但计量结果表明,劳动力的价格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不仅很小,而且与就业弹性是同方向变动,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价格增加,就业弹性也在提高,从业人员也在增加。这与一般的经济理论预测结果是相反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1)从 1978 年到 2002 年,工资水平从 615 元上升到 2426.66 元,增长了 3.95 倍,而同期人均 GDP 则从 379 元增长到 2420.26 元,增长了 6.39 倍。也就是说,劳动力成本比例在这个期间下降了,相对工资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所以才会出现劳动力价格与 GDP 就业弹性同方向的变动。(2)对 1989 年到 2002 年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工资上升情况的分析表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工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的增长速度,同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人数(见图 2)。这显示了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对高素质就业人员需求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对低素质就业人员需求的增长速度,劳动力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从而导致就业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3)并未违反劳动力需求的一般规律。一方面工资水平上升,劳动力需求人数下降;反过来也是如此。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力需求曲线出现了右移(见图 3)。由于两者的作用方向相反,导致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与 GDP 就业弹性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4)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不完善,劳动力价格的调节作用不能完全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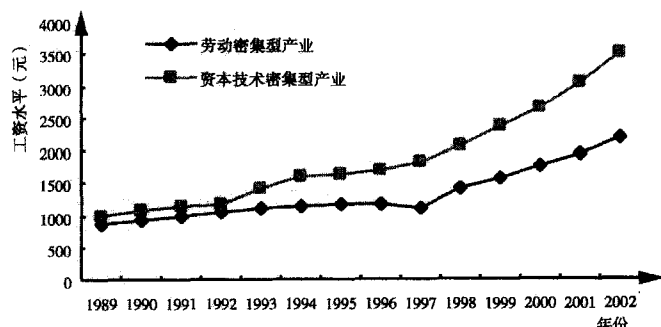


图 2 1989~2002 年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工资水平增长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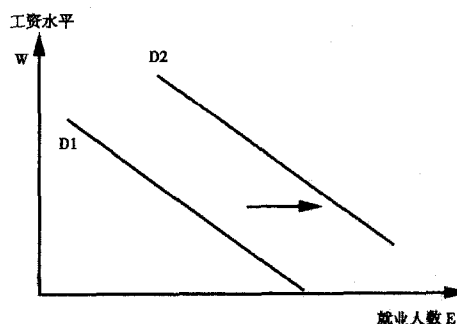


图 3 经济持续增长导致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变化

(二) 经济体制变革对 GDP 就业弹性的影响分析

3 个计量方程都显示,经济体制的变革因素对就业弹性的影响最大(见表 2)。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因素对就业弹性的影响是相反的,即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就业弹性,而经济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则提高了就业弹性。这也符合一般的观察,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它使得公有制企业获得了更为自主的劳动用工权,能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整企业的工人数量,并很快反映到就业弹性的变化上来。1995~2000 年之间就有大约 5000 万左右的工人从国有企业集体下岗失业,公有制企业的雇员人数在迅速减少,而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就业人数却在增加。与公有制企业不断减少的雇员人数相反,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政策环境的鼓励并迅速发展,雇用的就业人员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大量的新增就业岗位都出现在非公有制企业里。从长期来看,针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属于短期因素,其对 GDP 就业弹性的负面影响不会长久维持,而经济产权主体的多元化过程则会持续进行,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还将进一步上升,所以可以预见,经济制度变革因素从长期来看会提高就业弹性。

(三) 收入增长对 GDP 就业弹性的影响分析

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就业弹性具有很大的影响,表示经济环境变化的收入因素与就业弹性的值呈现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就业弹性有变小的趋势。由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劳动就业制度变革是个短期因素,而经济增长则是一个长期因素,并且对就业弹性的变化趋势有着更加直观的影响。对该因素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收入因素与 GDP 就业弹性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590 ,同时散点图也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比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见图 4)。那么,为什么收入是影响 GDP 就业弹性变化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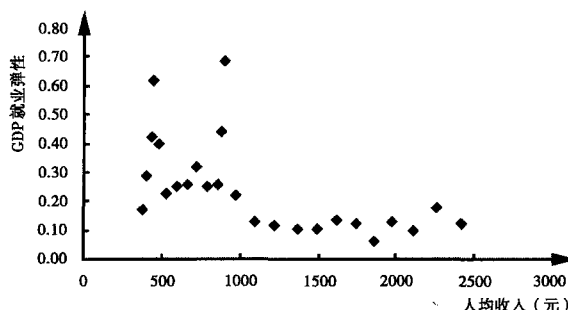


图 4 GDP 就业弹性与人均 GDP 的关系

第一,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导致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虽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良好的就业效应,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较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也随着下降。与此相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较高,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其市场份额在逐渐上升。对制造业结构变动的实证分析表明,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需求比重上升最快的是资本技术密集产业(郭克莎, 2004)。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就业弹性低于劳动密集型产品,那么,这种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就必然导致中国 GDP 就业弹性的下降。

第二,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会使技术进步作为增长来源的重要性逐渐提高。经验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作为增长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是随发展阶段变化的,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增长方式才会发生改变。另外,从技术进步发生的条件看,技术进步的发生是以资本积累为先决条件的,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从总体上讲只有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条件进行高风险、商业性的技术开发(郑玉歆, 1999)。

第三,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也促进了教育的扩展,而教育的扩展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也使劳动力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出现了劳动力“以质代量”,降低了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

三、就业弹性下降过程中的积极就业影响

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就业弹性出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削弱了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大之间的联系,对中国依靠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减少失业的努力造成不利影响。然而,在中国就业弹性下降过程中,并非完全是对就业扩大的不利影响,它还对就业的持续增加具有积极的一面。

(一) 城镇非农就业人员的增加依然保持较快速度,城镇就业弹性依然保持较高水平

中国 GDP 就业弹性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迅速下降,并保持在略高于 0.1 的水平,同时期非农就业弹性也在不断下降,但中国城镇就业弹性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如 90 年代以来(1990~2002 年)的城镇就业弹性平均值为 0.36,而且比起 80 年代以来并没有下降的趋势,反而有所上升(见图 5)。从 GDP 就业弹性、非农就业弹性和城镇就业弹性的变化趋势来看,绝大部分非农就业机会产生在城镇里,而农村的就业机会——包括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增长率却在不断下降。这种情况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加快,得益于城镇化加快而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在不断增加。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城镇就业机会的创造就显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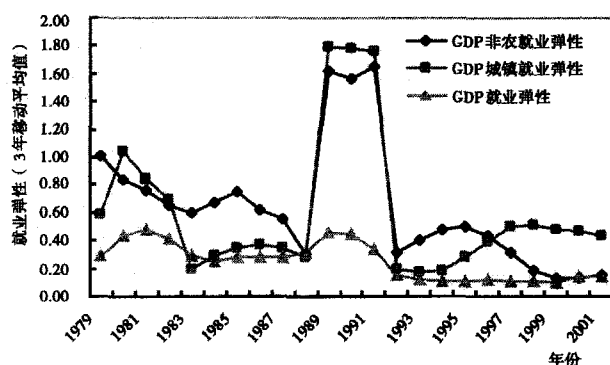


图 5 1980~2001 年 GDP 就业城镇就业弹性

就会越少,就业岗位的增加也就越少。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一方面是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另一方面则是就业弹性的下降,这其中就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对就业的增加产生积极的一面。其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会促进就业的稳定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和基础,经济增长只有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才是可持续的。从解决就业问题来说,经济的持续发展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最根本途径,其他解决就业问题的方法只能以此为基础。其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就业结构,提高就业容量。劳动生产率是收入增长的源泉,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而就业弹性比较大的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和空间与居民收入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杨宜勇,2001)。同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促进生产的专业化,提高对第三产业的需求。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要素禀赋因素并不是影响就业弹性变化的重要因素,而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收入、经济增长导致的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才是影响就业弹性变化的重要因素。相对于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来说,劳动就业制度的变革对就业弹性的负面影响是个短期因素,是暂时性的,而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对就业弹性的负面影响则是长期性的。因此,过分强调节约资本资源,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并不能提高就业弹性以增进就业,进一步扩大经济主体产权的多元化和设法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才是提高就业弹性和促进就业的关键措施。

参考文献:

1. 张军(2003):《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上海三联书店。
2. 托马斯·G·罗斯基(1999):《中国:充分就业前景展望》,《管理世界》,第9期。
3. 周其仁(1997):《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管理世界》,第5期。
4. 陈剑波(1997):《中国工业改革与效率: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5. 袁志刚(2002):《中国就业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
6. 郭克莎(2004):《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及政策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7. 郑玉歆(1999):《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由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争论谈起》,《经济研究》,第5期。
8. 杨宜勇(2001):《城区社区就业发展前景巨大》,《经济活页文选(理论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萍)